

江澤民時期對臺政策的黨軍權力運作——以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為例

The Power Politics of the Party and the Military in the PRC's Policy toward Taiwan in Jiang Zemin Period -- A Case Study of the Taiwan Strait Missile Crisis in 1996

馬順隆 (Shun-Long Ma)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生

摘 要

自2016年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後，中共對臺採行壓力與拉力的兩手策略，並以機艦多次強行繞臺威嚇，形同臺海危機重演之前兆。本文以第三次臺海危機為例，探討中共對臺政策，以檢視其黨軍雙方的決策行為模式；另結合黨的制度化領軍與民族主義發展等變項，聚焦以江澤民時期黨軍關係在其高層政治的權力運作為主軸，探究其雙方角色變動的趨向；由於軍方在其高層政治權力結構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致使軍方確屬權力支配的重要力量，在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制定發揮關鍵性作用。就此，論述黨與軍方在對臺決策的競爭角力，及彼此間的權力運作方式，解析雙方在對臺政策之角色意涵與競爭性的均衡關係。

關鍵詞：黨軍關係、對臺政策、臺海危機、以黨領軍

Abstract

Sinc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wo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the PRC has adopted a two-hand strategy consisting of both “push” and “pull” tactics toward Taiwanese society. Accompanied by aircraft and vessels cruising around Taiwan's aerial/maritime areas, the development is interpreted as the precursor to another Taiwan Strait Crisis. As such, this paper takes the Third Taiwan Strait Crisis in 1996 as a case study to revisit the formation of the PRC's Taiwan policy to examine China's party-army relations amid the PRC's decision behavior model. Furthermore, the analysis combines the variables of the party's institutionalized leadership over ar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army in the Jiang Zemin period and its high-level political power as the main axis,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trend of changes in the roles

of both parties. Given the PLA's decisive role in China's high-level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the army indeed becomes a crucial influencing party on power distribution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formulat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diplomacy policies. Hence, by reviewing China's party and army for competitive roles in PRC's policy on Taiwan, as well as their power operation model,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party and army's respective role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competitively balanced relationship on formulating Taiwan policy.

Keywords: Party-Military Relations, Taiwan Policy, Taiwan Strait Crisis, The Party Leads The Army

壹、前言

2016年總統選舉民進黨二度贏得執政，兩岸關係卻呈現「冷和」局勢，臺灣海峽可能再次陷入危機，中共可能仍為主動者。當前中共在國際世局展現高度自信之時，收復與統一臺灣的決心隨之升高。自2016年底起，中共軍方頻繁「威懾」臺灣，包括以「遼寧號」航艦及遠程戰轟機繞行臺灣，挑釁意味濃厚。儘管兩岸經濟及社會交流密切，但自2020年臺美關係逐漸升溫及美方官員數度訪臺，共軍機艦則在臺灣週邊海空域進行密集「針對性」越區巡航，極具軍事壓制脅迫意圖。尤其中共「十九大」之後，黨內政治的制度性權威增強，「黨指揮槍」的法理建設漸次完成，更加確立共軍從屬性與共黨政權的本質—「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雖然「和平共處」是兩岸最理想的選項，但在中共亟欲追求更大國際影響力的意圖下，在其過程可能會出現非理性行為。¹就賽局理論

(Game Theory)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概念，以宏觀的視角觀察，隨著兩岸局勢升高，若貿然投入戰爭，亟易牽動美「中」臺三邊之政經軍等各項環節的變化，如無絕對勝算，難獲具體實效。從微觀的角度檢視，兩岸在毫無互信機制的基礎下，如未以全般思維與審慎應處，臺海危機的歷史可能重演。除非兩岸當局具有足夠的政治智慧，繼續維持「鬥而不破」的態勢。

面對兩岸關係「低迷」發展，中共以臺灣當局未承認「九二共識」為由，對臺採行「政治孤立、軍事恫嚇及社會、經濟融合」等兩手策略；而臺灣則以「維持現狀」立場及「四不」原則，尋求兩岸關係互動發展新模式。中共卻未善意視之，更加大對臺壓力，抑制外部空間與機艦繞臺震懾，對臺形成不利態勢。因此，本文之目的，在探討中共黨軍雙方的互動行為模式，以江澤民時期1995～1996年間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事件，²檢證黨軍之間對臺決策行為的競爭角力與妥

1 康培莊(John F. Copper)著，劉泰廷、許劍虹譯，《飛彈、政客與秘密外交：臺灣問題專家四十年的深度觀察》(Playing with Fire: The Looming War with China over Taiwan) (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頁25-26。

2 臺灣海峽危機，係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相隔臺灣海峽，兩個政權在高度的軍事衝突對峙下，可能引發全面戰爭的潛在危機，一般認知曾計發生三次。第一次（1954年～1955年：九三砲戰、一江山戰役及大陳島撤退），1954年9月3日，共軍對金門駐軍發動砲擊；1955年1月18日，共軍首次以陸、海、空軍

協共識，如何應對臺灣的局勢發展。

有關中共黨軍關係的研究領域，畢克福特(Thomas J. Bickford)認為，可以區分兩個基本途徑：派系模型(Factional Model)及專業化模型(Professionalization Model)。³ 派系模型主在強調共軍內部存在的私人派系網絡關係，此模式在低度制度化及高度政治不確定時期，較具論述價值，但在改革開放時期已不合宜。⁴ 專業化途徑的主要論點源自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對於文人統制及軍事專業主義(Military Professionalism)的理論。從主觀(Subjective)及客觀(Objective)文人統制分析對於軍隊的控制；但此觀點以西方民主國家的軍文關係進行分析論述，而中共則屬列寧式的集權體制國家，軍隊必須服從共黨並對共黨效忠，並不存在文人統治的問題。⁵ 此一研究途徑或模型的操作性定義，須有所調

適與修正。

隨著中共改革開放，軍隊在「國防現代化」政策推動下，全面朝向「專業化」(Professional)建軍方向發展，使其屬性漸次偏重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以致軍事專業主義模式的解釋力增強；其軍隊專業化的需求，則催化共軍自主性。當中共軍隊趨向專業化發展，會尋求制度上較大自主性及較少政治活動，不至於達到與黨分離的地步。⁶ 但長期「黨的軍隊」(Party Army)色彩，以及軍方在中共高層政治的特殊地位及其政治影響力，可透過權力運作方式，影響中共決策產出的結果。

一般對於中共黨軍關係的認知，共軍大致忠於黨的領導，在列寧式的政治體制，軍隊不會挑戰黨的領導。⁷ 但由於軍方在其高層政治的權力結構，確屬權力支配的重要

協同作戰，攻佔一江山；同年2月8日~2月11日，大陳島軍民船運撤退至臺灣。第二次（1958年：八二三砲戰及九二海戰），1958年8月23日，共軍對金門駐軍發動砲擊近50萬發；同年9月2日，中華民國海軍沱江號完成運補作業後，在金門料羅灣附近海域遭遇共軍魚雷艇包圍攻擊，9月22日美國支援8吋口徑巨砲運抵金門展開反擊，以致共軍封鎖金門失敗。第三次（1995年~1996年：臺灣海峽飛彈危機），1995年5月22日，美國總統柯林頓(William J. Clinton)決定允許時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於當年6月赴美進行「非官方的私人訪問」，參加康乃爾大學的畢業典禮，李登輝因此成為首位訪美的中華民國總統；中共認為美國助長臺灣內部謀求獨立的政治勢力以及試圖影響臺灣首次總統直接選舉，旋於1995年7月及1996年3月，進行兩次大規模飛彈試射演習。詳見，林正義，〈南海及臺海安全研究的觀察〉，《亞太研究論壇》，第31期，2006年3月，頁147-151；以及張淑雅，〈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2001年12月，頁231-290。

3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1979: What Have We Learned? Where Do We Go?," in James C. Mulvenon and Andrew N. D. Yang, ed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 Retrospective on Chinese Military Studies in the Post-Mao Era* (Santa Monica: RAND, 2001), pp. 1-37.

4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1979: What Have We Learned? Where Do We Go?," p. 16.

5 Amos Perlmutter & William M. LeoGrande, "The Party in Uniform: Toward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6, No. 4, December 1982, pp. 778-780.

6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pp. 25-27.

7 Paul H. B. Godwi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The Guerrilla Experienc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11, No. 3, 1978, pp. 165-277.

力量，可以在國家安全及外交政策制定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就此，本文聚焦以江澤民時期黨軍之間在其高層政治權力運作為主軸，探究雙方互動模式與角色變動的趨向；另以第三次臺海危機的對臺政策，審視黨軍雙方權力運作的變數及影響，以解讀兩者在對臺決策的角色對應，以檢證黨的制度化領軍之建構，推論黨軍之間互動行為模式的發展導向。

本文在解析中共自第三代領導人的政治權威轉變後，形成黨軍菁英階層二元分立，黨軍關係自不同於革命世代的毛、鄧局勢；由於第三代「職務權力型」領導人欠缺毛、鄧的個人領導威權，也無軍隊的個人關係網絡。基此，共黨如何控制軍隊的有形武力，以形成掌握政權的重要支柱；共軍又如何運用其武裝力量，在黨內扮演重要角色，進而獲致本身所需利益；尤以黨軍雙方如何應處對臺決策行為，以建構何種領導體系的權力結構。

中共黨軍菁英階層的權力運作，係屬一種「議價協商、利益交換」的形式。共黨提供軍隊的實際益處（例如：增加資源、軍事專業自主性、軍譽權位等），務使有關政策議題獲致軍方的支持，以確保共軍維持忠誠度。尤以中共領導人政治威權欠缺穩固時，更為突顯。檢視中共政權結構「集體領導」決策體制，其決策行為高度取決於領導集體對政策議題的共識導向，使領導階層的黨軍雙方設法運作有利策略，以符合其利益，以致形成彼此相互競爭性的權力均衡支配，獲取整體及各自的相對利益。

對於此種權力平衡作為之目的，係為防止任一體制內團體主宰領導集體的其他成員，以確保成員相對權力均衡性，也避免軍隊在集體領導體系中成為具有主導性的團體。本文的問題意識，係以第三次臺海危機的對臺政策為例，試圖解釋與回答中共黨軍之間在其高層政治權力結構的決策行為模式，以探索雙方應處對臺政策之角色及競爭性的均衡關係。

就專業主義模型而言，1991年的波灣戰爭強化中共發展現代化武力的趨勢，並全力強化軍事專業化的知識與技能。在理論上，後革命時期的菁英階層轉型與分立，會促進專業主義的發展，專注於專業化而較少涉及政治事務。⁸就此，本文的研究問題，採藉由對於中共政權結構「集體領導」之決策行為模式的探討，結合黨制度化領軍與民族主義發展等變項，以論述解析中共黨軍雙方在第三次臺海危機的議價妥協、權力平衡等依變項的衝突與消長。當臺灣爭端問題呈現，文人統制可否牽動影響黨對軍隊的控制，以及民族主義是否可以成為黨軍雙方爭取政治資源的利器，彼此又採以何種形式的運作，以致在對臺政策能否產生其所需的效果；最後黨軍之間究否可以達成彼此競爭性的權力平衡狀態，均殊值進一步探究此般現象的發展成因。

本文研究架構區分三部分，先就中共的黨軍菁英階層結構轉型及其特質進行文獻探討，以解析其黨軍菁英階層二元分立，與其黨軍雙方獨特的共生性及專業主義對於共軍自主性的驅動；次以探討中共對臺政策的

8 Ellis Joffe, "Party-Army Relation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46, June 1996, p. 310.

權力運作，檢驗其對臺政策的運用與操作，以及中共對臺決策機制的權力運作形式；最後檢證中共黨軍對臺決策之競爭性的權力均衡狀態，闡釋其「黨指揮槍」法理建構對於軍隊的制約，以及在民族主義激化與黨軍共識妥協下的恫嚇政策。綜上以第三次臺海危機的對臺政策，歸納評析中共黨軍關係發展對其權力結構的影響因素，實證其黨軍之間的權力運作形式，以深入解析中共黨軍雙方競爭性的均衡關係，及其對臺政策的趨向發展。

貳、文獻探討

一、黨軍菁英階層二元分立

中共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革命元老日漸凋零，呈現新的權力格局，自此領導人權力來源出現轉變。「個人權威型」領導人退去，轉以「職務權力型」領導人為主軸。發生此轉變的關鍵，在於後革命世代領導人缺乏革命建國功勳，無法迅速建立穩固個人權威基礎。在此情況下，中共領導人必須利用職務權威以鞏固權力基礎。⁹

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就此指出，革命建國功勳的重要性，可形塑領導人的政治權威，使得正式職務與實際權力不對稱。¹⁰「個人權威型」領導人即使毫無正式

職位，仍可透過個人威望影響決策。此為毛、鄧等革命世代領導人，與江、胡、習等後革命世代領導人最大的差異；由於鄧後領導人未具「雙重菁英身分形式」，以致黨與軍隊領導人自此展開軍文二元分立，而其黨軍關係進入轉型期。

西方學界對於軍文關係的概念，乃基於傳統的派系主義模型，認為軍人與文人係屬具有截然不同價值與規範的領域。¹¹基賽利茲尼克(Michael Kiselycznyk)與孫飛(Phillip C. Saunders)，對中共政治體系的軍文角色提出相對的看法，中共以革命黨的形式組建創立共軍，在革命時期的黨與軍隊之間交織經歷，以黨的高度透過思想、組織與人事的政治控制模式，主宰共軍官兵中心思想與價值理念等種種作為，造就黨軍「雙重角色菁英」(Dual-Role Elite)，自難以符合西方軍文關係模式。¹²然而，自第三代「職務權力型」領導人的政治權威轉變後，形成黨與軍隊菁英階層二元化趨勢，擴大文人與軍人兩大領域的分立。

波爾穆特(Amos Perlmutter)及列奧格蘭德(William M. LeoGrande)對此認為，共黨革命世代的領導人曾經歷黨與軍隊的職務，在黨軍之間建立恆久關係。後革命時期，文職領導人在必要時會介入軍事事務，而軍隊領

9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7月），頁7-9。

10 Frederick C. Teiwes,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p. 58-59.

11 Dennis Woodward, "Political Power and Gun Barrels: The Role of the PLA," in Bill Brugger, ed.,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78), p. 72.

12 Michael Kiselycznyk and Phillip C. Saunder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Assessing the PLA's Role in Elite Politics," *INSS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2*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ugust 2010), pp. 4-11.

導人也在共黨內部維持獨特的政治地位，使黨與軍隊領導人的界限模糊不清。¹³ 美國蘭德公司研究分析師何蓓詩(Elizabeth Hague)指出，中共自第三代領導的政治與軍事菁英階層已趨向二元化，由於文職與軍方的職涯發展管道各異，益形擴大此種菁英二元化現象。¹⁴ 再加以軍隊專業責任與團體認同感增強，愈益導致黨軍菁英階層的分立。

在江澤民時期的黨軍關係進入另一發展階段，囿於黨軍菁英階層二元分立，世代交替的中共領導人面臨實際領軍的困難，使中共黨軍關係增添不穩定的變數。江澤民在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接任總書記，同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接任中央軍委會主席，由於未具「雙重角色菁英」的歷練，無法保證可全般行使與運用實質權力。因此，鄧小平在1989年11月會見參加中央軍委會擴大會議的軍方領導人，特別強調江澤民是「合格的軍委主席，因為他是合格的總書記」。¹⁵ 要求軍方支持江澤民，以有助於穩定黨軍關係，進而利於江澤民逐漸樹立在軍隊的統治威望。就此，共軍雖因黨軍菁英階層二元分立，但難以保持政治中立，無法擺脫政治權力的安排與支配。

鄭曉時對此指出，就中共黨史觀察，其

黨軍關係密不可分。軍隊領導人均為共產黨員，在中共高層政治的權力結構扮演重要角色及佔有特殊地位。軍隊的需求與利益，可經由正式與非正式政治途徑管道加以表達，對於有關的重要議題仍具影響力。¹⁶ 這種高層政治的非正式互動方式，使得軍隊專業化發展無法去除「政治化」，進而清洗共軍已然定型固化的政治性本質，以此顯現黨軍之間仍保有緊密關係。

二、黨軍共生結構的特質

在中共黨國體制下，軍隊在權力領導階層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波爾穆特認為，軍隊將黨與國家形成緊密的連結，若無軍隊的堅定支持，一黨制的威權主義無法維持。¹⁷ 因此，軍隊在威權體制的政治參與，乃屬黨國制度的自然與正常狀態。以此觀之，軍方涉及範圍愈廣，其政權安全強度愈高。此種絕對強制性的以黨領軍體制，形成黨軍「共生」(Symbiotic)結構的特質，軍隊不僅在黨菁英階層的發動下參與政治，也無從迴避政治趨向。基此，就中共觀點，軍隊政黨化或政治化有其必要，並使軍隊參與政治獲致合法性與正當性。

中共屬列寧主義的專制體制，基於黨與軍隊的獨特共生性，以「黨中有軍」及「

13 Amos Perlmutter & William M. LeoGrande, "The Party in Uniform: Toward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p. 781.

14 Elizabeth Hague, "PLA Leadership in China's Military Regions," in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Wortzel, eds., *Civil-Military Change in China: Elites, Institutes, and Ideas After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Carlisle Barracks, PA: U.S. Army War College, 2004), pp. 220-221.

15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34。

16 鄭曉時，〈政體與軍隊：臺灣文武關係(1950-1987)〉，《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5卷第1期，1994年1月，頁7-9。

17 Amos Perlmutte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Soviet Authoritarian and Praetorian States: Prospects and Retrospects," in Roman Kolkowicz & Andrzej Korbonski, eds., *Soldiers, Peasants, and Bureaucrats: 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and Modernizing Societ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p. 324.

軍中有黨」的形式延續。對此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認為，此種關係的特點，就是相互依存與共生利益行為(Symbiotic Behavior)。¹⁸就此密切關係與共同歷練，波爾穆特與列奧格蘭德主張，中共的軍隊不可能達到政治中立，完全自主性的軍隊有違列寧式的政治體制。¹⁹意指中共對軍隊行使政治思想、組織與人事等控制手法，列屬主觀文人統制，力使軍隊與黨的中心思想及菁英階層的價值理念保持一致。

詹克斯(Harlan W. Jencks)對此提出保守的看法，中共軍隊朝向專業化趨勢發展，但無法排除政治性活動，不可能與黨區隔分離。這種軍隊專業化並非「去政治化」，而是趨向「政治緘默」(Political Quiescence)。²⁰就此，意味中共軍隊遵行黨的控制與文人統制的原則，降低政治羈絆而專注於軍事事務。

赫斯普林(Dale R. Herspring)對於共黨文武關係的觀察認為，杭亭頓主觀文人統制模式，僅適於解釋政權與軍隊價值之間存在的衝突關係；與杭亭頓的主觀文人統制，相符之點在於黨軍之間利益衝突。²¹就中共的黨國體制，黨軍雙方或有價值觀的歧異，但不

必然出現衝突。最主要在於黨軍之間相互為用的體制利益，顯現兩者更具黨軍一體的「共生」特質。

毛文杰(Jame Mulvenon)對於後毛時代的黨軍關係提出，列寧主義的專制政體，非同西方的軍事專業化概念，異於杭廷頓主張軍隊應具的特徵。專業化軍官服從與效忠國家，增進軍事專業知識與技能，自我認同團體意識，具保家衛國的責任感，以及在政治上保持中立。²²毛文杰認為，由於共軍的獨特性，以致無法如同杭亭頓的理念主張，軍隊不會達到政治緘默，反而導致介入政治。²³檢證中共黨軍關係特質，反映出共同生活的體系與政治夥伴關係，顯現黨軍菁英階層之間的低度分化與高度流動。此種黨軍一體的結構模式，自1980年代推動多項改革作為的結果，有助於促進軍事專業主義成長，此自主性專業軍事領域的轉型，對於主觀文人統制及黨控制軍隊的傳統概念，亟易形成衝擊。

三、專業主義對共軍自主性的驅動

隨著中共軍事現代化發展的進程，軍隊的自主性日益明顯。對於專業主義的論述，使其黨軍關係產生多面向的變化。部分抱持

18 David Shambaugh,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7, September 1991, pp. 527-568.

19 Amos Perlmutter & William M. LeoGrande, "The Party in Uniform: Toward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pp. 783-789.

20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pp. 28-31.

21 Dale R. Herspring, "Samuel Huntington and the Communist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25, Summer 1999, p. 568.

2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8-10.

23 James C. Mulvenon, "An Uneasy Bargain: Party-Military Relations in Post-Deng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s (Boston: NAAS, 1999), pp. 1-46.

專業主義者的觀點，認為專業化愈益提升軍隊的自主性，不利於黨對軍隊的主觀統制，甚而使軍隊威脅黨對武裝力量的控制，²⁴此明顯依據杭亭頓的客觀文人統制理論。然而，杭亭頓未對專業主義必然削弱主觀文人統制，作出具有說服力的論證。就此，如同芬納(Samuel E. Finer)所言，軍事專業主義可能是一把雙面刃，可使軍隊漸次脫離政治，但也可能使軍隊深入涉及政治。²⁵

共軍在專業化發展的趨勢下，已然提升共軍團體認同感及其對自身體制面的利益。孔適海(Isaac B. Kardon)與孫飛認為，共軍顯現軍事專業化、日益嚴整的團體利益、國家安全專業能力的提升、影響決策與權力分配的能量等多種特質，確已大幅提高在軍事領域的自主性；尤以鄧後中共領導人個人威權式微，更有利於共軍對有關政策發揮影響力。²⁶在此一背景下，共軍專業性功能，使其在政策議題及軍事領域，更有動機表達及追求其影響力與自身利益。

就中國19世紀滿清末年主權喪失與領土割據的動盪歷史，促使中共對於捍衛主權及領土完整極度重視。施道安(Andrew Scobell)

與哈樂德(Scott W. Harold)指出，中共堅持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容妥協，共軍身為此「核心利益」捍衛者的角色，使其在此議題具有充分表達意見的立場，展現不同於文職領導人的強勢態度。²⁷

共軍在中共對外決策行為的形成與演變中，對扮演能力的信心日增。李成(Cheng Li)就此觀察指稱，共軍是一個保守及具有高度民族主義立場的行為者，在壓迫高層文職領導人在對外政策與危機應處方面，採取整體性的強勢作為，以達到預期的目標。²⁸謝淑麗(Susan L. Shirk)也支持李成的看法，認同共軍是中共抱持極端民族主義的主要來源，而且支持對外力威脅採取強硬對抗性政策。²⁹由此可見，共軍國防現代化及軍事專業化的提升，功能性分工以專業化為主，使其在有關政策議題及軍事領域擁有相對影響力與自主性；同時在此範圍採取積極的競爭性操作，以爭取自身專業利益。

中共黨與軍隊領導階層，在其高層政治的權力結構，自始既存在共生關係網路；在其底層結構，由於軍事專業主義的發展，產生一種功能性的分離。對此約菲(Ellis Joffe)

24 Ellis Joffe, "Party-Army Relation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David Shambaugh and Richard H. Yang, eds., *Chi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 45; Harlan W. Jencks, "Party Authority and Military Power: Communist China's Continuing Crisis," in Bih-jaw Lin, ed., *The Aftermath of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in Mainland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1992), pp. 147-173.

25 Samuel 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Baltimore: Penguin, 1976), pp. 20-21.

26 Isaac B. Kardon and Phillip C. Saunders, "Reconsidering the PLA as an Interest Group," in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s.,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3-57.

27 Andrew Scobell and Scott W. Harold, "An 'Assertive' China? Insights from Interviews," *Asian Security*, Vol. 9, No. 2, May-August 2013, pp. 111-131.

28 Cheng Li, "China's Midterm Jockeying: Gearing Up for 2012 (Part 3: Military Leader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3, June 2010, pp. 1-17.

29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

認為，共軍具有「黨的軍隊」特質，並非西方意識的專業軍隊，其與中共政權本質深具「共生」的獨特性；而且軍隊也非黨的配角，在高層政治的權力運作有其重要角色與地位。共軍雖受派系主義及專業主義的傾向影響，但其黨與軍隊的整體結構仍然緊密相倚。³⁰

綜觀中共後革命時期黨軍菁英階層權力結構的轉型變遷，可以歸納有關特質如下。首先，中共的黨軍關係在1990年代最大的變遷，在於領導人權力來源的轉變。「職務權力型」領導人欠缺毛、鄧的領導威權，必須採行制度性權力與結構性機制，以建立及鞏固領導威權。其次，在以黨為主的政治體制，軍隊為黨的工具，運用其武力以維護黨的權力，軍隊藉以爭取團體利益。在實質上，軍隊領導人均為共黨成員，黨軍之間形成一種相互為用的共生關係，顯現在菁英階層的低度分化與高度流動。再者，在中共黨軍共生關係的常態下，經歷黨軍菁英階層轉型分立，與軍事專業化的推行，軍隊在特定時期（1989年天安門事件、1996年臺海危機）曾向黨爭取更大的自主性，而就軍隊對於黨的從屬性，此種自主性可劃屬為有限度的自主權。最後，這種黨軍關係模型關鍵所在，是政治對軍隊的嚴密控制與絕對領導。軍隊參與政治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來自黨的操控，以此展現制度化的威權，但也潛存制度化的危機。

參、中共對臺政策的權力運作

自1949年兩岸分治，中共在不同時空環境採行不同之對臺政策。蘇聯瓦解以致冷戰結束，國際局勢面臨重構，中共經濟改革相對成功，兩岸關係出現結構性轉變；臺灣則因民主化產生政黨輪替，增添兩岸關係發展的變數。由於臺灣島嶼型態的特殊性，對外安全事務易受週邊海洋及地緣戰略等影響，相對於中共則因「改革開放」國力增長及其對「祖國統一」展現戰略意圖，以致其對臺灣安全產生威脅。

一、中共對臺政策的運用與操作

1978年中共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發展成為其主要建設目標；在經濟建設的前提下，週邊環境的和平則為必然，致以武力為核心的對臺政策面臨調整。³¹ 1979年元旦，中共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鄭重宣布實施中共「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和平統一」代之以「解放臺灣」，顯現其對臺政策的重大轉變。³² 自此中共對臺政策以「一國兩制」為基本架構，係為其最終實現中國統一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採取過渡時期的策略作法。³³ 中共認為，此為理性、合情合理與兼顧政治現實的最佳解決模式。³⁴

中共對臺政策運作方式，以「和平統一」為前導及「武力統一」為後盾，透過相互為用的拉力與壓力兩手策略，採行政治矮

30 Ellis Joffe, "Party-Army Relation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p. 36.

31 張延廷，〈當前中共周邊區域戰略之策略與實踐〉（臺北：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2011年），頁155。

32 劉遺倫，〈中國對臺政策的歷史演變〉，《黨史文苑》（北京），2005年第6期，頁15。

33 程林勝，〈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研究〉（瀋陽：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86-87。

34 吳新興，〈中國統一問題：臺灣的觀點〉，《成功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4期，1991年12月，頁87。

化、外交孤立、經濟磁吸、文化統戰、軍事恫嚇等策略手段，主在藉由軟硬兼施，以「和平統一」的利誘及「武力犯臺」的大棒威嚇，兩者交互運用，進而施展運用其在國際格局的聲勢與影響力，迫使臺灣走向談判桌，接受其「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³⁵

若臺灣當局採行無限期迴避或拒絕談判，以致無法和平解決兩岸問題，中共可能以斷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以維護其主權與領土完整。基此思維，軍事手段可視為中共對臺政策手段之一，其運用方式將隨著國家整體戰略發展而調整實行。³⁶

中共對臺政策採取「堅持不放棄武力犯臺」，係為保持對臺政策的彈性與後盾，以維護其政權穩固與正統性。中共利用軍事武力恫嚇，使臺灣不得與其敵對勢力聯合，對其造成安全威脅與危害，並且警告臺灣不得利用兩岸交流之機，對其進行「和平演變」策略，進而危及其政權。³⁷

中共「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的對臺政策，從未「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這種以反向假邏輯表達的政策，充分顯現其以「武力統一」作為底牌的解決方式。就中共的角度而言，實現「國家統一」是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負責，不受任何事物影響，未到絕望決不貿然動武。因此，迫使臺灣走向談判

桌，必然以武力作為後盾。³⁸基此，中共對臺政策，首在防止臺灣獨立意圖與作為，並迫使臺灣談判，以接受其統一的架構；如若臺灣長期拒絕統一進程，則可能採以軍事武力，迫使臺灣接受統一。

二、中共對臺決策機制的運行

1995年6月7日，臺灣李登輝總統以「特別貴賓」身分，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其宣揚臺灣民主的內容與北京立場完全背離。對中共而言，李登輝的行徑充滿挑釁。直至1996年3月臺灣舉行首次總統直接選舉期間，由於選情激烈，候選人嚴厲批判中共的極權，非民主的人權紀錄，及其覬覦臺灣的野心，以藉此獲致支持與選票。對此，中共在鄰近臺灣的幾個目標，發動飛彈試射演習，呈現劍拔弩張的氛圍，導致臺灣海峽幾乎爆發軍事衝突危機。³⁹

中共在應處整體危機的決策行為過程，政治體制採以共黨的領導集體為核心之架構，反映黨、政、軍等組成對象的權力平衡考量。在此一體制下，高層領導謀求不同體系與利益的平衡，以及理性決策行為的編組方式。儘管領導階層仍持續競爭性的角力，但不若毛、鄧時期以非正式與個人化為主導，以共識導向與成文規範為主要的運行基礎，已趨向制度化形式。⁴⁰此種危機決策行

35 Lee Aekyung, "Taiwan's Mainland Policies: Causes of Changes,"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 Affairs*, No. 2, Summer/Fall 1996, pp. 337-339.

36 馮曉艷，〈中國共產黨對臺方針的歷史特點〉，《雞西大學學報》（黑龍江），第8卷第3期，2008年6月，頁50。

37 朱新民、洪中明，〈衝突？整合？海峽兩岸統一政策之研究（1988-1992年）〉（臺北：永然出版公司，1992年），頁78-79。

38 王文孝，〈臺灣軍力「和統」戒心極重〉，《星島日報》（香港），1995年3月2日，版A10。

39 康培莊(John F. Copper)著，劉泰廷、許劍虹譯，〈飛彈、政客與秘密外交：臺灣問題專家四十年的深度觀察〉，頁30。

為模式，在江、胡時期運作方式概同。相較之下，習近平時期則因機構分立，議事不彰及效率低落，而採以「小組治國」，發揮各領導小組的效能。

中共中央委員會「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是共軍參與對臺決策程序的重要機構，本身定位並非決策部門，卻是體制內資訊流通及凝聚各有關部門共識的溝通與議事協商機制。⁴¹ 有關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參與成員，包括總書記同時兼任中央軍委會主席、有關政治局常委會委員、黨政軍等機構負責對外政策的高層領導人—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國際聯絡部、國務院、外交部、國安部、中央軍委會、總參謀部等重要主管官員。⁴² 可依據各種危機本質，以決定其編組參與成員之多寡。

中共應對危機決策架構與流程，大部分以非正式及臨時性作法進行，而非制式化與常規化行為。在此一過程，軍方提供軍事資訊、情勢評估、意見表達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處於專業化功能性的關鍵地位。整個流程涉及領導階層各自所屬的團體利益，取決於各個角色間的關係互動。⁴³ 呈現出議價協商與共識妥協的運作形式，達成相互競爭性

的權力平衡狀態，以獲得整體或各自相對利益。

當李登輝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對於中共批評性言論之後，中共軍方立即採取因應作為。1995年6月，中共對臺最高政策制定機構—「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召開緊急會議，⁴⁴ 成員包括—中央軍委會主席江澤民、外交部長錢其琛、海協會長汪道涵、中央統戰部長王兆國、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劉華清（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張震以及副總參謀長熊光楷（熊為此領導小組機構的軍方代表）。會中三位軍方領導人向江澤民及錢其琛發難，堅持認為必須對臺採取嚴厲行動，此時軍方掌握與控制議程，以確保對臺政策的實行方向。⁴⁵

中共對此研處作法，其一採以小型攻島軍事演習，以嚴正傳遞警訊；其二則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以產生嚇阻臺獨的效果。對此作法的爭論認為，小型軍演無法對臺造成震撼，勢將促使臺灣人民逐漸習慣恫嚇，進而更支持臺灣當局；如若採行大規模軍演，其強度愈高，臺灣就愈可能屈服在壓力之下，惟此必將引起美國介入，易使兩岸問題推向國際。⁴⁶ 此種情勢推展形成兩難局

40 Michael D. Swaine, "The PLA Role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Crisis Behavior," in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s.,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58.

41 Bonnie S. Glaser, "The PLA Role in China's Taiwan Policymaking," in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s.,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69.

42 Michael D. Swaine, "The PLA Role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Crisis Behavior," p. 149.

43 Michael D. Swaine, "The PLA Role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Crisis Behavior," pp. 150-151.

44 Michael D. Swaine, "Chinese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Taiwan, 1979-2000,"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86-336.

45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pp. 178-180.

46 時殷弘，〈困難與選擇：對臺灣問題的思考〉，《戰略與管理》（北京），總第36期，1999年第5期，頁1-4。

面，無法提出立即性反制措施，又無可替代方式而自我受限。最後共識採以黨主導性形式，軍隊則以從屬性的建議推行，以國家現代化建設為首要，主要考量美國的介入，可能產生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嚴重後果，而將投入多數資源以強化軍力，迫使與美國進行長期對抗，不利整體經貿發展與延滯提升國力機會。⁴⁷就此顯示，北京各種政治勢力處於拉鋸狀態，藉採權力運作策略，以爭取整體及各自利益；康乃爾大學訪問及臺灣總統選舉的議題已使主張鷹派的軍方取得強勢的理由，決定以重手反擊。⁴⁸

三、黨軍之間對臺政策的權力運作形式

針對李登輝訪美的言行，北京已意識到對臺政策漸趨失靈，⁴⁹軍方則藉此要求對於臺灣採取嚴厲措施。中共決定在臺灣海峽試射飛彈，以傳達反獨警訊及武力恫嚇之意圖。在某種程度上，北京反李情緒高漲，係因當時中共境內激進民族主義快速成長，而鄧小平及支持改革派勢力，樂於以此取代「改革開放」的阻力衝擊。然而，對北京而言，臺灣問題係為高度敏感議題，李登輝訪美勢必引發北京內部嚴重失和與派系權力

失衡。此外，在鄧小平的晚年，接班人江澤民難以完全獲致強硬左派及軍方的認同。此時北京對臺政策必然受制李登輝訪美的嚴重衝擊，必須權衡情勢，適時採納軍方強勢作為，對臺施行更為強硬的反制行動。⁵⁰

在中共權力互動與鬥爭過程，軍方為支配政治的最大力量，且在政策制定過程發揮關鍵性作用，顯示軍方在高層政治佔有重要地位及相對影響力。⁵¹尤以第三代「職務權力型」領導人，未具黨軍「雙重角色菁英」歷練，缺乏個人威權與領導魅力；軍方則擁有通達最高領導人的正式管道，握有軍事力量，不受國家組織控制的獨立性，以及在決策與諮詢機制的代表權；⁵²致而在此軍事面向的危機決策下達過程，軍方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地位。⁵³

共軍自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勤王有功」之後，軍方的政治勢力日增，並在中共「十四大」由軍方老將劉華清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對於政策制定具有影響力。此外，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中央軍委會新增遲浩田、張萬年等兩位副主席，⁵⁴此二人被視為中共軍方「鷹派」典型

47 時殷弘，〈關於臺灣的幾項必須正視的大戰略問題〉，《戰略與管理》（北京），總第39期，2000年第2期，頁27-32。

48 蘇起，《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頁54。

49 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pp. 130-131.

50 Phillip C. Saunders, "China's America Watcher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 p. 55.

51 Vincent Cable and Peter Ferdinand, "China as an Economic Giant: Threat or 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0, No. 2, April 1994, p. 248.

52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9.

53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3), pp. 200-263.

代表，在對臺政策向來扮演強硬派角色。

中共軍方領導人對於特定政策及相關議題，有時會公開表達意見與看法，以發揮其影響力。然而，此類觀點是否轉化成為明確表達共軍的體制面「利益」，抑或衍生對共黨文職領導人的軍方壓力，難以明確判斷。⁵⁵ 由於中共集體領導體制，形塑全面性、均衡性與有效性的決策機制作為，共軍參與模式僅為多部門之一；⁵⁶ 而在「民主集中制」的運作下，已對共軍形成制約的效能。

相對中共「以黨領軍」的體制建構，1969年「九大」、1973年「十大」、1977年「十一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以及1975年「四屆」、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確訂定由共黨指揮軍隊，共軍是「黨的軍隊」，直接聽從黨的命令。⁵⁷ 1997年「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首部『國防法』，將「黨指揮槍」原則法律化，從而更加確立軍隊的從屬性與黨的領導地位。基於中共黨軍關係獨特的共生模式，黨軍菁英階層均共同致力於確保政權存續，以維護其各自及相對整體利益；共軍則在既定對臺政策一壓力與拉力的兩手策略，發揮體

制內影響力，極可能反應出共軍與文職高層領導人的共識取向。

中共政治體制的權力結構，共黨領導高層具有對外政策的最終決定權，但對外關係所有軍事行動，顯然無明確且決定性的控制。泛此類型的軍事行動，諸如邊境衝突、境外海空域軍演、越界軍事行動等，雖屬軍事性質，但對北京當局的外交關係造成重大影響。⁵⁸

對此黨軍之間的聯繫與調節，在毛、鄧時期因最高領導人同時擁有個人威權與領導魅力，且熟悉共軍運作方式，雖無正式規範，仍不至於產生重大問題。時至今日，共黨領導階層採以集體領導的權力結構運作，中共領導人並無政治主導權，且未深入瞭解軍事議題，導致無法確切掌控對外政策的個人權威與影響力。⁵⁹ 因此，共軍在上述領域可能擁有相當高的主導權。

中共面對李登輝的訪美言行，江澤民對臺表達強硬態度，係因憂慮軍方擅自行動而削弱其權力，接受採納軍方意見。隨著危機發展，顯見軍方掌握全局，甚至是主要決策參與者；顯見當下弱勢政權與強勢軍隊，⁶⁰

54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頁289。

55 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Prosp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p. 46-47.

56 Alice Miller, "The PLA in the Party Leadership Decisionmaking System," in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s.,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73-74.

57 Alice Miller, "The PLA in the Party Leadership Decisionmaking System," pp. 73-74.

58 James C. Mulvenon, "Rogue Warriors? A Puzzled Look at the ASAT Tes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Vol. 20, No. 1, February 2007, pp. 1-7.

59 Michael D.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anta Monica: RAND, 1998), pp. 77-78.

60 後鄧時期的中共領導人缺乏毛、鄧的革命地位與個人威權，因此極力建立可以獲得及運用權力的官僚體系之權力基礎。在此過程，中央的政治權力已下授地方，致此趨勢充滿不確定性；而薄弱的中央統治，對於

兩者之間的相互角力，以及雙方共識妥協與權力均衡等形式競爭性的操作。

臺灣內部發展是影響中共對臺作為主要因素，並不樂見臺灣內部政治情勢發展走向臺獨之路；但臺獨之聲從未止歇，中共則一再宣示臺灣如若獨立，將不惜任何代價攻臺。可以顯見，臺獨因素係影響兩岸情勢最大變數，也是中共對臺政策更替觸媒。⁶¹ 中共軍方對臺採取強勢作為，江澤民陷於權力掌控之路，由於江澤民欠缺毛、鄧的軍事資歷與個人聲望，以致對於政治權威的掌握與鞏固，端賴軍方支持與否。⁶² 基此，中共軍方在政策制定擁有更多實力與影響層面，尤其軍方在對臺政策的角色，不僅是執行者更是決策參與者，可見中共軍方政治勢力日增，對臺政策的影響至深且鉅。⁶³

肆、檢證中共黨軍對臺決策的權力均衡

中共對臺採以拉力與壓力兩手策略，本質並未改變，僅調整彼此間比重的變化，卻一再重申「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以解決統一的問題。若臺灣長期排拒統一進程，則採行武力，迫使臺灣接受統一架構，以維護主權與領土完整。中共對臺政策的強勢作

為變化，主要取決於黨軍之間競爭性權力平衡共識的影響，在「黨指揮槍」制度化原則及民族主義醞釀操作下，黨軍互有執著與折衝；由於共軍政治性色彩，在權力結構的比重制衡下，導致軍方在對臺政策具有重要地位與作用。

一、「黨指揮槍」法理建構的制約

當中共強行以飛彈試射，試圖恫嚇反擊李登輝的康乃爾之行，以及威懾影響臺灣總統選舉，卻未能撼動臺灣反共情結與選情結果。事後李登輝接受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採訪，宣稱江澤民雖然理性，但在無法控制軍方的情形下，處境顯得艱難；該文以中共政治派系主義解讀臺海危機，暗示派系內鬥與權力爭奪是北京常態，直指中共「默許」軍方採取試射飛彈的挑釁行為，達到「發洩情緒」目標。⁶⁴

對於李登輝訪美激起的風波，中共必須有所回應。就當時中共內部情勢，江澤民在1989年6月擔任總書記，同年11月接任中央軍委會主席，1993年就任國家主席，其掌權過程漫長，並與李鵬、朱鎔基、喬石等黨政大員集體決策重大事件。⁶⁵ 然而，江澤民在接替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會主席之後，由於未具毛、鄧的「軍事權威」，因而無法主導

可能爆發諸如臺海及南海的外部問題，促使共軍在國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享有重要的地位。參見C. Dennison Lane, Mark Weisenbloom & Dimon Liu,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Limited, 1996), p. 3.

61 Pao-min Chang, "The Dynamics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Crisis the Taiwan Strait,"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18, No. 1, June 1996, pp. 1-10.

62 Audrey Kurth Cronin and Patrick M. Cronin, "The Realistic Engagement of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9, No. 1, Winter 1996, p. 125.

63 蔡瑋，〈中共對臺政策的決策組織與過程〉，《中國大陸研究》，第40卷第5期，1997年5月，頁48。

64 康培莊(John F. Copper)著，劉泰廷、許劍虹譯，《飛彈、政客與秘密外交：臺灣問題專家四十年的深度觀察》，頁59。

65 蘇起，《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頁53。

及有效推展個人或領導集體決策行為，在對臺策略必須採納軍方的強勢作為。對此，江澤民深切自知，因此銳意突顯強調「黨指揮槍」以體現最高領導人的法理性。因此在「十四大」黨章特意加入一句以前「十二大」、「十三大」黨章均未出現的內容—「中國共產黨堅持對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領導」，⁶⁶其目的主在針對當時黨內外、國內外關於「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江」的質疑，就此採以黨的「法理」形式申明只能由掌握黨最高權力的江澤民指揮軍隊。

從黨章完成「黨指揮槍」的法理建設，江澤民隨即就國家「法律」層面著手，以限制軍人侵犯威脅其中央軍委會主席權位的可能性。1994年5月12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修改『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其中，修改『軍官服役條例』第七條，廢除一級上將軍銜，係因一級上將為終身職，無退休期限，廢除後可加速軍方新陳代謝，以降低老將干預軍務或有軍事強人出現的機會。再者，修改『軍官軍銜條例』第十條，規定中央軍委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實行主席負責制，中央軍委會主席不授軍銜，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及委員的職務編制軍銜均為上將。⁶⁷

新修條文明確界定中央軍委會主席為最高軍事統帥，採行首長制，強化中央軍委會主席的權力。就此，以國家「法律」形式

確立「黨指揮槍」原則，排除軍人擔任中央軍委會主席的機會，顯見江澤民的「黨指揮槍」係建構在「法理」的定位。更加重要的事實，在於中共高層政治決策體系，中央軍委會雖處此種權力結構其中一環，軍方高層領導人可就政策議題，藉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表達提出重要意見；但在中共黨國體制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擁有最高政治權力，文人領導階層對於國安相關政策議題具有最後決策權，彰顯「黨指揮槍」的結構與制度。⁶⁸

以1995～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的為例，顯現共軍向中共最高領導人提出對臺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但無證據顯示共軍採取違背黨的命令行為；共軍影響中共對臺政策的作為，也在黨對共軍所設定的限制範圍內。⁶⁹雖然此次危機應處的決策過程，共軍採強硬態度表達對臺政策，但政策取向並未與其他機構部門的立場相左，也未與中共既定政策背道而馳。

如此可以推論，中共對於「黨指揮槍」的法理建構，已能發揮法令規範的效能，有效制約軍隊對黨的服從與效忠。在中共對臺政策的決策過程，共軍提出強硬立場的表態。就其實質而言，共軍是奉行而非主導政策；因其政策方向一致，僅僅採行手段有別，亦即拉力與壓力的比重取捨。共軍是「兩手策略」的強硬作為，外宣機構則是安撫磁吸的手法。⁷⁰ 基此，共軍仍會在黨的制度

66 高新，《江澤民的權力之路》（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年），頁273。

67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頁179。

68 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72-73.

69 Bonnie S. Glaser, "The PLA Role in China's Taiwan Policymaking," pp. 166-167.

70 Bonnie S. Glaser, "The PLA Role in China's Taiwan Policymaking," pp. 190-191.

化領軍下，持續就其職能立場表達強硬政策作為。

二、民族主義激化的對臺政策

1996年，中共正面臨領導人接班後的危機，江澤民受制於週遭狂熱民族主義的掣肘，軍方又具政治影響力，導致無法抗拒來自軍方的挑戰—必須以軍事行動因應李登輝訪美的言行及臺灣總統選舉所代表的「分離主義」。共軍在中共菁英領導階層雖具有有限權力地位，但在面對國家安全與外力威脅時，仍抱持強硬對抗的立場，顯現共軍是高度重視民族主義的組織，致力於捍衛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⁷¹ 然而，軍方強硬立場的背後，另有議價妥協的原因，在軍方希望國防預算供給無虞，而軍事行動則是爭取預算最佳利器，致而牽動北京在處理「臺灣問題」不可過於軟弱，⁷² 以此展現黨軍之間的權力平衡狀態。

後冷戰時期的中共，民族主義的運用為其領導人團結人民與支持國家的工具。⁷³ 就理論而言，外部威脅常可助長與強化民族主義興起，民族主義的運用可轉移內部危機或不利情勢。⁷⁴ 大陸旅美學學者趙雲山指稱，中共屬強烈民族主義的國家，中共領導人無

人願意承擔臺灣獨立的歷史罪責。若攻打臺灣，中共將訴諸民族主義，將臺灣歸之美國、日本附庸，屬於分裂祖國的行為，必須以武力消滅臺獨勢力，保衛祖國領土與主權完整。⁷⁵ 就此，民族主義成為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可能導致戰爭的潛在因素。⁷⁶

中共犯臺意圖顯然存在，且面對國際現勢，快速崛起已引起矚目，必須營造和平的週邊環境，以利整體經濟發展。若臺灣踏越紅線或侵犯中共底線—臺灣宣布獨立或更改國旗國號，中共基於民族主義、內部撻伐議論與顧及骨牌效應等，將不惜任何代價，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若臺灣未宣布獨立，中共以和平週邊環境與經濟發展大局為重，嚴謹縝密採取對臺動武選項。⁷⁷

「國家統一」係在大陸的中國人廣泛認定的願望，⁷⁸ 軍方扮演強硬角色，一部分原因在其本身因素，另一部分則有加乘效果。軍隊作為一個國家機構，中共亟需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記憶清除殆盡，臺灣問題正可為其提供良機，利於其作為祖國的堅定捍衛者。⁷⁹ 此外，臺海危機也為軍方提供一個機會，使其可以展現中共對臺政策採取「戰爭」政策，⁸⁰ 藉由言論表達軍方的民族主義

71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pp. 66-77.

72 康培莊(John F. Copper)著，劉泰廷、許劍虹譯，《飛彈、政客與秘密外交：臺灣問題專家四十年的深度觀察》，頁33、47。

73 Michael Mandelbaum, "Westernizing Russia and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3, May/June 1997, p. 85.

74 Barry R. Posen, "Nationalism, the Mass Army, and Military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Fall 1993, pp. 80-124.

75 趙雲山，《消失中的兩岸》（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頁39-41。

76 邵宗海，《兩岸關係與兩岸對策》（臺北：時報出版社，1996年），頁216-218。

77 吳建德，《後冷戰時期中共武力犯臺問題之研究》（臺北：時英出版社，1997年），頁108-109。

78 Allen S. Whiting, "The PLA and China's Threat Percep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 June 1996, pp. 606-607.

79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No. 75, September/October 1996, p. 47.

80 You Ji, "Making Sense of War Games in the Taiwan Strai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 6, 1997, p. 295.

情感，彰顯軍方在對臺強硬政策，確屬不可或缺的角色與作用。

三、黨軍共識妥協下的恫嚇政策

中共發動飛彈試射演習，用意在于干預臺灣的對外關係及影響臺灣選舉。就中共的觀點而言，飛彈試射達成北京的政治與軍事目的，如果飛彈命中預期目標且震撼臺灣，北京可以隨時試射，使臺灣對此束手無策。然而，中共認為主要重點在於飛彈試射的舉措，已成功弭平臺獨的聲勢，嚇阻臺灣的分離主義，印證臺灣總統選舉的結果，可證實當時北京的看法。⁸¹

冷戰結束後，兩極化的世界格局與軍事對立消失，給予中共有利的國際環境，以致力綜合國力的發展。⁸²就此機勢而言，唯有快速提升經濟實力，才可推上強國之列；而經濟發展首重穩定週邊環境，方能確保經濟利益的鞏固。大陸學者閻學通在其著作《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將臺灣獨立運動的分裂活動勢力，視為對國家戰略利益的重大威脅，主要著眼於如若臺灣海峽發生戰事，建立不易經濟規模必定遭致嚴重影響，現代化建設所需和平環境隨之破壞。⁸³就此，中共對臺採取軍事動武，必然會縝密決斷，以免獲致不利後果，此為其對臺政策之重要考量

因素。

對於中共領導人而言，若無黨軍關係的密切配合，難以實行軍事恫嚇。恫嚇作為係以懲戒或示威性使用武力，掌控甚或壓制對方以改變其意向；⁸⁴強勢作為的成功則必須相互運用軍事及政治政策，亦即一方面展現令人可信的威懾，同時可以獲致預期的效益。然而，其中必須清楚表明武力威懾方式，而非被認定武力威懾是升級成為戰爭前的一種條件。雖然黨軍雙方均不希望出現戰爭，但中共領導人較趨向以隱喻與逐步施壓的方式形成威懾；軍方則傾向採用直接的方式，以大規模的武力展示，立刻將訊息傳遞，以表達自身的意圖與立場。⁸⁵就此，已可顯見雙方競爭性的策略手法，以獲致所欲達成的效果。

中共軍方對於外交部處理臺灣問題，直指其應對顯得軟弱，採用文攻施壓方式，無法獲致實際效果。當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說，實證臺灣已步向獨立之路；而臺灣內部公開支持獨立的言論與勢力，似獲得更多民眾的支持。對此，共軍堅定要求對抗美國及李登輝言行的壓力，發表一系列嚴詞批判臺灣獨立及宣示共軍已做好維護領土完整準備的公開聲明，全力主張安撫手法已然失

81 康培莊(John F. Copper)著，劉泰廷、許劍虹譯，《飛彈、政客與秘密外交：臺灣問題專家四十年的深度觀察》，頁57-58。

82 Denny Roy, "Restructuring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eds.,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40.

83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54-160、172-178。

84 Alexander George,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and Strategy," in Alexander George, David K. Hall and William E. Simons, 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Laos, Cuba, and Vietna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p. 18.

85 Thomas A. Fabyanic, "The Grammar and Logic of Conflict: Differing Conceptions of Statesmen and Soldiers," *Air University Review*, No. 32, March/April 1981, pp. 23-31.

效，有必要以軍事威脅，嚇阻採取進一步的動作。⁸⁶

就中共軍方觀點，自實行「和平統一」政策以來，並未使「和平統一」前景更加光明，以致當下應為展現多一點「軍事武力」而少一點交往。⁸⁷然而，解讀1995～1996年飛彈試射的武力展示，顯現共軍對於中共領導的影響力。江澤民等文職領導人也可能認同對臺採取強硬手段，惟僅止於警示而非激化成為與美國大規模軍事衝突。基此考量，以致其演習「目的、範圍、時間、地點」等均已事前宣布。⁸⁸中共黨軍菁英領導階層對於軍事演習的舉措，係認定可用於威脅臺灣的重要策略手段之一，黨軍雙方均希望避免演習升高為軍事衝突。由此可知中共政權結構「集體領導」的決策體制，呈現不同體系與利益權力平衡考量，採以領導集體為核心的共識；共軍在對臺政策制定則發揮由下而上的顯著影響，證明共軍在政策運作的有力角色。⁸⁹

伍、結 論

2016年5月臺灣總統選舉由民進黨贏得政權後，即呼籲中共「接受事實」以正視臺灣問題；中共以蔡政府未承認「九二共識」採取反制作為，其策略依序為經濟、政治、軍事壓力。北京三管齊下，先採以經濟緊縮臺灣經濟之時，再逐步升高政治孤立抑制外部空間，進而施以軍事震懾採行軍機航艦

繞臺恫嚇。然而，蔡英文總統仍堅持以「維持現狀」的立場及「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走回對抗的老路、不在壓力下屈服」的原則，採取「遠中」策略，致使兩岸關係並未和緩。

檢視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顯示，中共自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黨軍菁英階層二元分立，愈益擴大黨軍之間各自職涯發展趨勢。在應對有關內外議題時，黨軍關係已迥異於革命世代的毛、鄧威權政治。共黨對軍隊控制，更加依賴制度化與職務性權力；而共軍對黨的支持形式，對中共領導人政治權力具有關鍵性作用。鑒於黨軍之間的「共生」本質，雙方在應處對臺決策的行為模式，採取「議價協商、利益交換」等競爭性手段方式的應用，以滿足均衡各自及整體的需求與利益。在中共黨國體制下，軍隊從屬於黨的領導，但確屬權力支配的重要力量。軍隊將共黨與國家形成緊密的連結，若無軍隊的支持，一黨專政的威權主義無法維持；軍隊無從迴避政治趨向，在有關政策議題發揮關鍵作用。

面對臺灣獨立的問題時，即行充分運用黨制度化領軍及民族主義操作，以化解黨軍彼此的歧異，雙方權衡調適獲致共識。就李登輝訪美及全民選舉總統等趨向獨立的發展，採取有限度強勢對臺策略，發動飛彈試射的軍事恫嚇作為，展現「黨指揮槍」的法理制度與政權統治合法性，以及共軍在高層權力結構的政治影響力與主權堅定捍衛者的

86 Jing Huang and Xiaoting Li, *Inseparable Separation: The Making of China's Taiwan Policy*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10), p. 399.

87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pp. 175-176.

88 Jing Huang and Xiaoting Li, *Inseparable Separation: The Making of China's Taiwan Policy*, p. 192.

89 Bonnie Glaser,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Averting Accidents and Building Trust in the Taiwan Strai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 No. 27, 2005, pp. 91-104.

角色。證明黨軍彼此的權力平衡狀態，兩者互賴共利與相互為用，以獲取黨軍雙方各自與整體利益。

在中共內外部形勢變動時，軍方扮演的政治角色愈益重要。中共領導人必須藉軍方支持以穩定政局，軍方則經由議價形式獲取有關利益或權力，此種共生模式為黨軍關係互動基本形式。基此，中共軍方是否冀望在對臺政策取得更為優勢的發言權或決策權，仍有待觀察。但理性推論，從近年中共領導人對臺兩手策略，若內外部情勢未發生重大變化，此種氛圍與態勢可能將持續。

中共領導人政治地位鞏固與權力掌握，主要在控制軍隊的力量。最佳作法在力求「黨指揮槍」領導地位與法理正當性。中共領導人施以優遇，以換取軍方在政治保持緘默或表態支持，不至於如同江澤民當政初期軍權未穩，在對臺政策發言權或決策權給予軍方最大優位。如此，臺灣海峽安全問題的主要關鍵，在於中共領導人的認知，而非軍方對臺的態度。

（收件：109年5月14日，接受：109年10月27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朱新民、洪中明，1992。《衝突？整合？海峽兩岸統一政策之研究（1988—1992年）》。臺北：永然出版公司。
- 吳建德，1997。《後冷戰時期中共武力犯臺問題之研究》。臺北：時英出版社。
- 邵宗海，1996。《兩岸關係與兩岸對策》。臺北：時報出版社。
- 高新，1997。《江澤民的權力之路》。香港：明鏡出版社。
- 寇健文，2010。《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程林勝，1991。《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
- 張延廷，2011。《當前中共周邊區域戰略之策略與實踐》。臺北：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
- 趙雲山，1996。《消失中的兩岸》。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公司。
-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閻學通，1996。《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蘇起，2014。《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專書譯著

- 康培莊(John F. Copper)著，劉泰廷、許劍虹譯，2017。《飛彈、政客與秘密外交：臺灣問題專家四十年的深度觀察》

(*Playing with Fire: The Looming War with China over Taiwan*)。臺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期刊論文

- 吳新興，1991/12。〈中國統一問題：臺灣的觀點〉，《成功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4期，頁76-90。
- 林正義，2006/3。〈南海及臺海安全研究的觀察〉，《亞太研究論壇》，第31期，頁147-151。
- 時殷弘，1999/10。〈困難與選擇：對臺灣問題的思考〉，《戰略與管理》（北京），總第36期，頁1-4。
- 時殷弘，2000/4。〈關於臺灣的幾項必須正視的大戰略問題〉，《戰略與管理》（北京），總第39期，頁27-32。
- 張淑雅，2001/12。〈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6期，頁231-290。
- 馮曉艷，2008/6。〈中國共產黨對臺方針的歷史特點〉，《雞西大學學報》（黑龍江），第8卷第3期，頁45-58。
- 劉遺倫，2005/6。〈中國對臺政策的歷史演變〉，《黨史文苑》（北京），第6期，頁12-35。
- 蔡瑋，1997/5。〈中共對臺政策的決策組織與過程〉，《中國大陸研究》，第40卷第5期，頁38-52。
- 鄭曉時，1994/1。〈政體與軍隊：臺灣文武關係(1950-1987)〉，《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5卷第1期，頁7-9。

報紙

王文孝，1995/3/2。〈臺灣軍力「和統」戒心極重〉，《星島日報》（香港），版 A10。

外文部分

專書

- Finer, Samuel E., 1976.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Baltimore: Penguin.
- Huang, Jing & Li, Xiaoting, 2010. *Inseparable Separation: The Making of China's Taiwan Policy*.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 Huntington, Samuel P., 1957.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encks, Harlan W., 1982.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Lampton, David M., 2001.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e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ne, C. Dennison, Weisenbloom, Mark & Liu, Dimon, 1996.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Limited.
- Nathan, Andrew J. & Ross, Robert S., 1997.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W.W. Norton.

- Saunders, Phillip C. & Scobell, Andrew, 2015.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ambaugh, David, 2002.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Prosp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irk, Susan L., 2007.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ettinger, Robert L., 2003.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Swaine, Michael D., 1998.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anta Monica: RAND.

專書論文

- Bickford, Thomas J., 2001.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1979: What Have We Learned? Where Do We Go?," in James C. Mulvenon and Andrew N. D. Yang, ed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 Retrospective on Chinese Military Studies in the Post-Mao Era*. Santa Monica: RAND. pp. 1-37.
- George, Alexander, 1971.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and Strategy," in Alexander George, David K. Hall and William E. Simons, 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Laos, Cuba, and Vietna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pp. 1-20.
- Glaser, Bonnie S., 2015. "The PLA Role in China's Taiwan Policymaking," in

-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s.,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6-197.
- Hague, Elizabeth, 2004. "PLA Leadership in China's Military Regions," in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Wortzel, eds., *Civil-Military Chang in China: Elites, Institutes, and Ideas After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Carlisle Barracks, PA: U.S. Army War College. pp. 220-248.
- Jencks, Harlan W., 1992. "Party Authority and Military Power: Communist China's Continuing Crisis," in Bih-jaw Lin, ed., *The Aftermath of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in Mainland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p. 147-173.
- Joffe, Ellis, 1997. "Party-Army Relation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David Shambaugh and Richard H. Yang, eds., *China's Military in Trans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32-50.
- Kardon, Isaac B. & Saunders, Phillip C., 2015. "Reconsidering the PLA as an Interest Group," in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s.,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3-57.
- Kiselycznyk, Michael & Saunders, Phillip C., 2010.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Assessing the PLA's Role in Elite Politics," *INSS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2.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p. 1-22.
- Miller, Alice, 2015. "The PLA in the Party Leadership Decisionmaking System," in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s.,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73-74.
- Perlmutter, Amos, 1982.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Soviet Authoritarian and Praetorian States: Prospects and Retrospects," in Roman Kolkowicz & Andrzej Korbonski, eds., *Soldiers, Peasants, and Bureaucrats: Civil - 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and Modernizing Societ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p. 310-340.
- Roy, Denny, 2000. "Restructuring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eds.,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p. 121-146.
- Swaine, Michael D., 2001. "Chinese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Taiwan, 1979-2000,"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89-336.
- Swaine, Michael D., 2015. "The PLA Role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Crisis Behavior," in Phillip C. Saunders and Andrew Scobell, eds., *PLA Influence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1-165.
- Woodward, Dennis, 1978. "Political Power and

Gun Barrels-The Role of the PLA,” in Bill Brugger, ed.,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Croom Helm; New York: Bames & Noble Books. pp. 62-78.

期刊論文

- Cable, Vincent & Ferdinand, Peter, 1994/4. “China as an Economic Giant: Threat or 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0, No. 2, pp. 220-245.
- Chang, Pao-min, 1996/6. “The Dynamics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Crisis the Taiwan Strait,”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8, No.1, pp. 1-25.
- Christensen, Thomas J., 1996/9-10.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No. 75, pp. 36-58.
- Cronin, Audrey Kurth & Cronin, Patrick M., 1996/10-12. “The Realistic Engagement of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9, No. 1, pp. 110-132.
- Fabyanic, Thomas A., 1981/3-4. “The Grammar and Logic of Conflict: Differing Conceptions of Statesmen and Soldiers,” *Air University Review*, No. 32, pp. 1-36.
- Glaser, Bonnie, 2005.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Averting Accidents and Building Trust in the Taiwan Strai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 No. 27, pp. 91-104.
- Godwin, Paul H. B., 1978.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The Guerrilla Experienc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11, No. 3, pp. 165-277.
- Herspring, Dale R., 1999/4-6. “Samuel Huntington and the Communist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25, pp. 557-577.
- Joffe, Ellis, 1996/6. “Party-Army Relations in China: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46, pp. 299-314.
- Lee, Aekyung, 1996/4-9. “Taiwan's Mainland Policies: Causes of Changes,”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 Affairs*, No. 2, pp. 310-335.
- Li, Cheng, 2010/6. “China's Midterm Jockeying: Gearing Up for 2012 (Part 3: Military Leader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33, pp. 1-17.
- Mandelbaum, Michael, 1997/5-6. “Westernizing Russia and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3, pp. 76-92.
- Mulvenon, James C., 2007/2. “Rogue Warriors? A Puzzled Look at the ASAT Test,”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Vol. 20, No. 1, pp. 1-7.
- Perlmutter, Amos & LeoGrande, William M., 1982/12. “The Party in Uniform: Toward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6, No. 4, pp. 762-798.
- Posen, Barry R., 1993/7-9. “Nationalism, the Mass Army, and Military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pp. 80-124.
- Saunders, Philip C., 2000/3. “China's America Watcher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1, pp. 32-60.
- Scobell, Andrew & Harold, Scott W., 2013/5-8.

“An ‘Assertive’ China? Insights from Interviews,” *Asian Security*, Vol. 9, No. 2, pp. 111-131.

Shambaugh, David, 1991/9.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7, pp. 527-568.

Teiwes, Frederick C., 1995/6.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 *China Journal*, No. 34, pp. 58-59.

Whiting, Allen S., 1996/6. “The PLA and China's Threat Perceptions,” *China Quarterly*, No. 146, pp. 601-632.

You Ji, 1997. “Making Sense of War Games in the Taiwan Strai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 6, pp. 287-305.

研討會論文

Mulvenon, James C., 1999/3/11-14. “An Uneasy Bargain: Party-Military Relations in Post-Deng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s. Boston: NAAS. pp. 1-46.